

敬业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

媒体人经常参加活动,工作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人民出版社的媒体宣传,说不上是什么时候,他们开始邀请我参加出版社的各种宣传活动,并在长期的合作中形成了良好的工作关系。他们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非常值得我学习。敬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的基本要求。什么叫敬业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。梁启超在《敬业与乐业》一文中认为,凡做一件事,将全副精力集中在这事上头,一点不旁骛,便是敬。说白了,“敬业”就是全身心地

投入工作,全神贯注,心无旁骛。

记得有一次,人民出版社的孙琳菲正在歇产假,我当时因为一些报道问题硬着头皮找到了她,而她并未因歇假而耽误我的采访工作,反而积极联系响应,使我的工作顺利完成。这种敬业的精神,让人敬佩。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,各类纪念活动逐渐升温。遥想当年,仁人志士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抛头颅、洒热血,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作为今天的商报人,我也要有仁人志士的时代担当,要传承他们的奉献精神,传递好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接力棒。(张岱)

《中国出版传媒商报》(原《中国图书商报》,以下简称商报)自诞生之日起,就伴随着业内外广大读者的呵护和关爱一路成长,没有他们的长期关注和大力支持,就没有商报的今天,在此,我们一并表示感谢。他们当中既有业界精英和前辈,也有读着这份报纸走进大学殿堂的传道授业者,也有依靠她获取相关资讯的新闻出版从业者,还

有出版机构的掌门人和大书城大卖场的管理者,更有坐得住十几年冷板凳的研究型学者和书评人……值此商报诞辰20周年之际,我们诚恳地邀约这些商报的建设者和领读者,与我们一起分享他们与商报的传奇故事,讲述他们心中的商报以及商报人,让我们共同见证彼此的成长,愿下一个20年,我们更加辉煌靓丽。

风雨同行二十年

艾立民(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)

1996年,我从人民出版社调任当时的新闻出版署发行司任副司长,商报(当时叫《中国图书商报》)就成为我了解业界动态,研究出版发行改革,传递政府部门管理信息的重要载体和媒介。那个时期我的许多行业信息主要来源于商报,可以说每期必看,我工作中的一些研究文章也几乎都是在商报首发的。那个时期由商报发起的关于“中盘”,关于民营书业地位、作用以及中心书城的建设等问题的大讨论,对推动出版发行行业改革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。特别是经我提议,由商报牵头成立了专门的图书市场信息研究机构——开卷图书市场信息调查中心,后来发展成为中

国首家图书市场销售信息调查与评价的专业公司,为行业发展和书业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近年来,商报秉承关注行业、服务企业、引领发展的理念,始终坚持围绕中心,服务大局,坚持商报为商的鲜明个性,始终保持着行业媒体风格本色,赢得了大家的赞誉。

时代在进步,行业在发展,希望商报借20年华诞之机,百尺竿头更进一步,实现打造一流全媒体的宏伟目标。

立足当下 贴近出版

傅培宗(中国出版协会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)

1992年7月我调入化学工业出版社,2012年6月退休后,又在中国出版协会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工作至今。在20多年出版生涯中,商报一直是我喜爱的出版方面的报刊之一。商报办报宗旨明确,理念先进,思路清晰,敢于创新,办报方向总是立足当下,贴近出版。

商报不断介绍国内外出版的最新动态,最新理念,最新举措,最新经验,从中我们吸收到出版工作的丰富营养,更新和充实了我们的头脑。商报为出版行业办报、为出版工

作者办报,以鲜明观点揭示当时出版行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;预先想出版人所想,为出版人提供借鉴;及时介绍出版人所需所急所干的重要事项;关注出版市场,关心编辑、发行、出版管理工作,不断指引我们,不断指导我们,不断鞭策我们。

商报面向全球、面向全国、面向全行业、面向所有出版工作者,立足现实面向未来,版面内容不断丰富,不断创新、不断充实、不断提高,办报的整体质量上乘。

商报是我的良师益友。希望商报就出版面对的热点、难点、疑点问题开展讨论,甚至不同观点可以争论,规律越辩越白,真理越争越清。愿商报今后办得更好、更成熟、更成功,更加立足当下、贴近出版。

一次座谈会小记

白焯(评论家,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)

大约是在1994年秋季的某天,当时供职于新华书店总店的程三国,约我和其他几位友人去他那坐坐,说是聊聊《图书发行》改报的事宜。我如约前往,在那里见到了被同时约来的谢玺璋、黄集伟等友人。

那天聊了些什么,具体细节已记不太清,但程三国对未来报纸绘声绘色地描绘与展望,仍历历在目。大家都感到,在图书领域里,出书的品种与数量越来越多,行业本身也在不断地扩展与延伸,无论从现状上还是发展上看,办一份像样的报纸来与之相应,是绝对必要的,以便给行业搭建一个信息的平台,也给读者打开一扇瞭望的窗户。可能大家还聊到了

报纸的路线与特色,栏目与重点等。

1995年《中国图书商报》正式面世,虽然也是一份小报,但比之原先的《图书发行》,无论是视野的广阔性,还是内容的丰富性,都摇身一变,大为改观,明显地更上了一层楼。

因为参加过这样一次有关《中国图书商报》的创办座谈会,我对这份《中国图书商报》和改名之后的《中国出版传媒商报》,心里怀有一种莫名的亲切。20年来,从《中国图书商报》到《中国出版传媒商报》,无论是她举办活动,还是约写文章,我都毫不推辞,尽心尽力。看到她越办越好的状态,越来越大的影响,我更是由衷地高兴。

见证商报的成长与变迁

蔡国诚(上海东方出版交易中心常务副总经理)

由《图书发行》到《中国图书商报》再到《中国出版传媒商报》,从更名可看出商报在市场变革中的不断成长、革新与发展。作为一位仍在岗的老新华人,我见证着商报的成长与变迁。

成长。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,我作为上海新华业务员,坚持阅读每期的《图书发行》,通过她了解行业规定和市场动态,对自己的工作开展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。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,随着发行变革,新华书店总店业务模式与购销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,在总店的转型中,商报通过市场化运作,成功实现了市场化转型,也由行业指导性报纸成为具备市场化基因的行业媒体,实现了业务

层次的提升。

革新。1995年《中国图书商报》正式诞生,这一阶段是发行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,以商报为代表的行业媒体,对发行商业、业务模式以及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思索,见证了行业改革与变化。

发展。商报正式更名为《中国出版传媒商报》顺应了行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形势。同期,东方出版交易中心也强化了与商报的合作,共同打造商报·东方数据平台。全媒体发展是书业未来发展的大方向,东方出版交易中心与商报将在跨行业、跨媒体整体合作下,共同探讨行业大数据的发展,定会拥有广阔前景。

商报约稿琐记

陈宝贵(中国出版协会副秘书长)

说起我与商报的交往,不由得使我想起一件出版界老领导王益同志亲自为商报组稿、审稿、改稿的往事。大约是2000年前后的一天,王益同志打电话把我叫到府上,拿出一叠有关日本电子出版的最新科技材料,嘱我将它们翻译成文,供出版界参考、借鉴。初稿编译出来后,王益同志亲自对稿子进行审阅和编辑加工,甚至不放过一个标点符号。定稿后,王益同志说,为了早一些让同志们了解国外出版技术动态,还是报纸快一些,这篇稿子就投给商报吧。经王益同志推荐,报社采用了这篇稿件,责任编辑几次与我电话沟通,讨论稿件,力求准确无误,最后商报用整整两个版的篇幅发表了这篇译文。文章刊登出来后,在业界引起关注,我多次接到业内人士打来的电话,共同探讨有关问题。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,但我仍珍藏着这张报纸,至今不忘王益同志对我的教诲、提携,以及由此而与商报建立起

的紧密工作联系。

商报是我们出版业土生土长的行业报,文风朴实,紧贴出版实际,敏感地关注着出版业的一举一动,及时报道,宣传推广。由于工作的关系,很长一段时间以来,报社总编室主任方菲“盯”我很紧,经常与我保持电话联系,了解情况,掌握信息,不漏掉一次报道的机会。因此,凡是中国出版协会举办的重要活动,商报都及时地进行了宣传报道,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。

商报从小到大,从弱到强,真实、完整地记录了中国出版业的改革、发展历程。而今它已进入“弱冠之年”,“长大成人”。衷心希望商报不断发展繁荣,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下,紧跟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时代步伐,抓住互联网+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,再接再厉,为出版业的大发展大繁荣鼓劲加油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再立新功。

商报20情

60·20

同行篇

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纪念特刊

我与商报的情缘

写在商报诞辰20周年之际

(排名不分先后,以姓氏首字母为序)



艾立民



白焯



蔡国诚



陈宝贵



傅培宗



韩建民



何春华



黄集伟

我跟商报有很深的感情

韩建民(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)

我跟商报的交情十几年前就开始了,当时还叫《中国图书商报》。那时候跟李际平老师比较熟。李老师非常敬业,而且热心肠,她那时候应该是社长助理。有一次我们一起在昌平开会,李老师还专门开车送我到市里去办一些事,我印象特别深刻,还挺感动的。

商报信息量比较大,另外对出版社适用性也非常强,经常刊登国内外大量的出版信息,我有专门订,而且每天都会阅读。调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来之后与商报联系更为紧密。印象最深的是,有一次张丽霞向我约稿,我提议不要做一般的广告样式,想要有点创新。商报比较体谅出版社,和我们出版社一起精心策划,做了一版“交大出版社的年青人”,上了三四十个交大社的员工,刊登出来后影响很大,也调动了这些年青编辑投身出版事业的激情。

中国书业的一面镜子

何春华(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公司副总经理)

由《中国图书商报》更名改版而来的《中国出版传媒商报》是中国书业的一面镜子,它的前身是新华书店总店主办的《图书发行》。1988年9月,我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出版发行专业,在资料室看到这份报纸,同学们轮流看,欲提前了解未来职业,值不值得高分如我等去追求,导师曾告诉我们:你可以尝试转系或考研究生。可以说,《图书发行》成为我们认识、了解书业,憧憬未来职业业的窗口。

1988年7月,我与4位同班同学毕业分配到深圳市新华书店。1995年,《中国图书商报》诞生。这次更名改刊恰逢中国书业腾飞的开始。我认识了报纸的主创团队——程三国、陈斌、李际平、张维特等,他们

的创业精神和报纸的清新风格让我欢喜,偶尔写个“豆腐块”,久之成为好友。1996年11月6日~18日,深圳书城隆重开业,第七届全国书市在书城成功举办,创造了全国书市的七项纪录,扭转了书市的颓势。也正是在本届书市期间,商报出版了《书市快报》,每天一期,以最快的速度送达书市现场和各省、区、市代表团驻地酒店,反应极好,评价极高。当时,商报提前策划,早做准备,商报人日夜拼搏奋战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,心中常常涌起对那段往事的留恋和敬意。

岁月易逝。今天,《中国出版传媒商报》早已登场。作为老读者、老朋友,希望它还是那面可爱可亲的镜子。

别来忽忆君

黄集伟(接力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)

我在《中国图书商报》工作时间不长,虽然我上班时条件艰苦,人手匮乏,物料短缺,收入微薄,可在商报工作短短5年,心情愉快,也有微薄成就感。当时的工作同事程三国、张维特、李际平、陈斌、郭虹、戴昕、胡延平、李丽、尚英林……至今想起,仍有故交之慨:“相见亦无事,别来忽忆君”。

在商报老址及迁址外研社后,先后有贾海燕、迟宇宙、张波、沈浩波、萧三郎、姜宁馨等青年才俊到报社随我实习,他们的海洋才华、无量锐气至今让我记忆犹新。还记得外研社三层北半部格子间里,沈浩波窝在电脑前奋笔疾书,一写一整版,女朋友陪着他,困极了,就趴在办公桌上歇

会儿……转眼间,沈浩波大娃早念书了?二娃打酱油了?

大概是搬到外研社后的第二年,商报即从4开8版的小报改为对开大报,经程三国、张维特授意,我开始张罗为大版商报重新设计报头。几番协商、讨论,最终确认,选用的报头字里,商报报头大概是当时报业报头中唯一采用“大标宋”+“书法字”组合的报纸。我请好友李颖明从书法大字典里先抠出个“图”字,再抠出个“书”字,最后完成报头设计。其中,那个“图”字出自画家唐寅,“书”字出自书法家米芾,我当时的想法是,邀约遐邇闻名两位大家穿越时空为商报“题字”,倍有面子吧。(下转第63版)